



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时间和契机考

曹 永 年

一、问题的提出

《魏书·序纪》云：

献皇帝讳陵立。时有神人言于国曰：“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居。”帝时年衰老，乃以位授子。

圣武皇帝讳诘汾。献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其迁徙策略，多出宣献二帝，故人并号曰“推寅”，盖俗云“钻研”之义。

这是现存关于拓跋鲜卑第二次南迁的唯一的一条历史记载。

这条出诸“人相传授”的史料，极为简略，拓跋部南迁匈奴故地的许多重要情况都是迷离恍惚，看不清楚。1980年嘎仙洞北魏太平真君四年李敞石刻祝辞的发现，宣帝率众“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之大泽为呼伦池，已可成为定论；但，第二推寅（陵）——诘汾南迁的时间，契机等，还有待索隐考订，才能求得近似的了解。

胡三省注《通鉴》，最先提出“推寅”就是檀石槐西部大人“推演”。他说：“《魏书》曰：汉桓帝时，鲜卑檀石槐分其地为东、西三部，其大人曰置鞬、落罗、日律、推演、宴荔游等，皆为大帅。推演盖即推寅也。”①马长寿先生接受这个见解，同时明确指出：檀石槐西部大人推演并非宣帝推寅，而是献帝陵，即第二个推寅。②此说在《魏书·序纪》和王沈《魏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拓跋早期历史增添了许多珍贵的资料，人们可以藉此揭示更多的史实；关于献帝陵的南迁问题，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找到解决的钥匙。

不过，推演即推寅说，尽管显示了卓越的才识，但仅以同音立论，缺少充分的依据，难以消除人们的疑窦。本文拟作进一步探讨，在肯定檀石槐西部大人推演即第二推寅的前提下讨论拓跋族南迁匈奴故地的时间和契机。

二、西部大人推演就是第二推寅

我们判断檀石槐西部大人推演为拓跋族长酋第二推寅，理由如下：

第一，名号相同。推演与推寅声韵相通，为同一名号的略有差异之译写，这胡三省、马长寿已经指出。尽管不能仅持孤证遽然视推演即推寅为定论，但作为论据之一，应该是有说服力的。

这里有两点需要澄清。其一，檀石槐的西部大人是推演，还是“日律推演”，需要澄





清。中华书局标点本《三国志·鲜卑传》于裴注引王沈《魏书》记檀石槐西部,断句为“其大人曰置鞬落罗、日律推演、宴荔游等。”③倘作“日律推演”,那么是否能够与推演勘同,就很难说了。这段文字,马长寿的标点则为“置鞬、落罗、日律、推演、宴荔游等”。④按,《三国志》《后汉书》载异民族多音节人名,总以汉人眼光和习惯去理解、记录,凡三个音节以上的人名,一般只载其最末的三个或两个字。南匈奴“句龙吾斯”略记为“吾斯”⑤,羌“无弋爰剑”略记为“爰剑”⑥均其例。所以两书《鲜卑传》记鲜卑人名,如偏何、於仇贲、满头、燕荔阳、乌伦、其至鞬、檀石槐、和连、騫曼、魁头、步度根、扶罗韩、軻比能、泄归泥、素利、琐奴、郁筑鞬、蒲头、弥加、厥机、沙末汗、成律归等,无有超过三个字者。甚至,于三个音节的鲜卑人名,也往往理解为姓名结合,略其“姓”而呼其“名”。《三国志·鲜卑传》多处称軻比能为“比能”,称泄归泥为“归泥”,称郁筑鞬为“鞬”。又,东汉、三国时匈奴、鲜卑,以“鞬”为尾音的人名不少,匈奴有於除鞬,鲜卑有其至鞬、郁筑鞬等等。所以马长寿的断句,列日律、推演为两个人是正确的。

还有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是,南迁前岭已经传位于子诘汾,檀石槐西部大人之中如果有拓跋族的首长,那应该是诘汾,为什么还以推演闻名?岭已经传位于子是事实,但不能忘记,拓跋部两次迁徙,“其迁徙策略,多出宣猷二帝”,岭因为建立了这样辉煌的业绩而受到人们的推崇。摩尔根说:

在美洲各地的土著中,所有的氏族,都以某种动物或无生物命名,从没有以个人命名的。当社会处在这种低级状态时,人的个体性被氏族所掩盖了。我们至少可以推想希腊和拉丁部落的氏族在早先某个时期也是如此命名的;但当他们在历史上居于显著地位之时,其氏族已经以个人命名了。⑦

我国古代,某个少数民族的首领功业卓著,他的名字、职衔往往会成为氏族名,成为部落名,成为后继酋长名,被其后裔所继承,被周邻诸部所传颂。《后汉书·乌桓传》:“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这是乌桓的情况。吐谷浑作为部名,由该部始祖的名字转来;⑧呼韩邪单于的称号,为稽侯珊的孙子比所承袭。⑨类似的实例不在少数。⑩因此,岭尽管已经让位于诘汾,甚至可能已经不在人世,拓跋族的酋长以推演(推寅)为外人所传称,都不是不可理解的。

第二,活动地域一致。

王沈《魏书》云,檀石槐分三部,“从上谷以西至燉煌,西接乌孙为西部,二十余邑”。推演的具体驻牧地点虽不可考,但在上谷以西至燉煌、乌孙之间这一大致方位则是明确的。

《魏书·序纪》载,第二推寅(岭)——诘汾率领拓跋族南迁,经过九难八阻,历年“始居匈奴之故地”。“匈奴故地”所在,马长寿说:“《汉书·地理志》五原郡有头曼城;《匈奴传》亦谓阴山为冒顿所居,治弓矢练骑射以伐东胡。故此所谓匈奴故地,当指匈奴单于祖先发迹之所的漠南汉五原郡内。”⑪《史记·匈奴列传》还保存了一条非常明确的记载:“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数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当蒙恬渡河据阳山即阴山脉北假中的时候,头曼被迫北徙,正说明头曼本来就驻牧阴山北麓汉头曼城一带,并在这一地区发迹。所以,这里在魏晋仍被称作“匈奴故地”,是不难理解的。

诘汾以后拓跋族的活动地域,也有助于我们准确地判定岭——诘汾的南迁地点。《魏书





·序纪》称：圣武帝诘汾之子，始祖神元帝力微“元年，岁在庚子。先是，西部内侵，国民离散，依于没鹿回部大人窋宾。”以“先是”发端，盖追叙诘汾时事。没鹿回部驻牧何处，确切地点不可考，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谓其“得匈奴旧境，又徙居之”。力微曾请求窋宾准予“率所部北居长川”，其三十九年又“迁于定襄之盛乐”（今内蒙和林格尔）。⑫足见没鹿回部和拓跋部的活动地域，不出阴山山脉左右，即今大青山、乌拉山两侧之乌兰察布草原和土默川。诘汾自即位初南迁匈奴故地，以后未见再有长途迁徙之举，那么这个“匈奴故地”应该就在阴山北麓。

檀石槐西部大人推演驻牧于上谷至燉煌、乌孙间的某地，拓跋部在第二推寅——诘汾领导下南迁阴山北麓：二者牧地一致。

第三，时间吻合。

檀石槐西部大人推演的生卒年无从考订，但是当166年檀石槐分其地为三部时，推演作为西部二十余邑中的一位大人活动于历史舞台，则是确凿可靠的。拓跋部的第二个推寅陵与檀石槐西部大人推演如果是同一个人的话，那么他必须在166年以前率所部南迁到匈奴故地。

现存史籍关于拓跋部的最早历史纪年是力微元年。《魏书·序纪》载，力微元年“岁在庚子”。同卷，力微42年遣子沙漠汗入曹魏为质，是年“魏景元二年也。”《通鉴》亦于是年始记拓跋事。由此上推42年，力微元年为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庚子；与“元年岁在庚子”的记载相符。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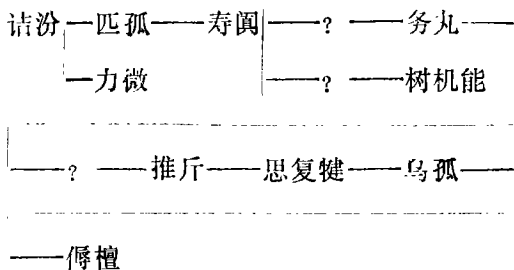
但《序纪》又称，力微“凡享国五十八年，年一百四岁”。力微卒于晋武帝咸宁三年，戊戌，公元277年；据以上推104年，当生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乙卯，公元175年。因此，175年才是目前能够推定的最早的确切纪年。

这样就使我们得以确切地知道关于诘汾的两个重要年代：

（一）诘汾于175年生力微；

（二）由于父死子继，诘汾的去世当在公元220年。

可以作为诘汾行年推算依据的还有秃发氏的世系。《晋书·秃发乌孤载记》：“秃发乌孤河西鲜卑人也。其先与后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魏书·源贺传》载拓跋焘“谓贺曰：‘卿与朕源同，因事分姓，今可为源氏。’”《新唐书·宰相世系五上》对于所谓“源同”有重要的补充：“源氏出自后魏圣武帝诘汾长子匹孤。九世孙秃发傉檀，据南凉，子贺降后魏”。⑭根据《晋书》记载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提供的资料，可以编制秃氏世系如下：



在这张世系表里，乌孤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去世；树机能晋武帝咸宁五年，公元279



年为马隆杀害，这都是史有明文的。树机能死至乌孤死，其间四世约120年，平均一世三十年。由树机能死，上推四世至匹孤生，亦当为120年上下，那么诃汾长子匹孤当于公元160年前后降生。

于是，关于诃汾的生平，我们有了第三个年代可资研究。

（三）、160年左右生长子匹孤。

在这三个年代中，除160年生匹孤为间接推算所得，可能有数年之差而外，其余两个年代都是准确可靠的。

根据这三个年代，我们不难作这样的推测：如果以诃汾18岁生长子匹孤，那么他33岁生力微，78岁去世。考虑到其子力微104岁，诃汾享年78岁，是不会使人奇怪的。由220年上推78岁，诃汾之生年当在公元143年或略晚一些时候。

当公元166年檀石槐分三部时，诃汾年龄在24岁左右，其父阌即第二推寅大约五六十岁，《序纪》称其“时年衰老”，不为过分，这与檀石槐西部大人推寅在时间上恰好相当。

第四，重大事件合拍。

《后汉书·鲜卑传》：“自檀石槐后，诸大人遂世相传袭。”^⑤这就是说，包括西部大人推寅在内，从檀石槐时期开始，大人职位世袭。《魏书·序纪》载，第二推寅献帝阌在南迁前以“年衰老，乃以位授子”，也开始世袭，正是在檀石槐时期。

《后汉书》《三国志》《晋书》以及南北朝八书，记北方匈奴、鲜卑诸族史事，歧义纷呈，往往前后无法贯通。这是因为魏晋大乱，中原诸王朝无暇北顾，且适逢北方草原亦处于分裂消沉状态，许多情况也无法深究。至于匈奴、鲜卑诸族的历史则仍在继续沿着自身的轨道发展；三国两晋之际，十六国北魏之交北方民族的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是应该而且能够缀合的。王沈《魏书》的推寅与魏收《魏书》的第二推寅，不仅名号相同，时间、地点以及重大事件亦皆合拍，应该是同一个人。

三、南迁匈奴故地的契机

诃汾生年和檀石槐西部大人推寅即拓跋阌的考定，还为我们探讨拓跋部南迁匈奴故地的契机，带来了令人欣喜的曙光。

诃汾生于143年，当166年第二推寅（阌）——诃汾作为檀石槐西部大人出现在漠南的时候，他才24岁。诃汾能够继他父亲阌任酋长，并且执行阌的命令组织南迁，至少应该接近成年。那么拓跋部由呼伦贝尔南迁阴山北麓，当在诃汾14至24岁，即156——166年这十年之间。

恰恰在这个时期，蒙古草原上正经历着一场天翻地覆的变化。

《后汉书·鲜卑传》：桓帝“永寿二年（156年）秋，檀石槐遂将三四千骑寇云中。”这是檀石槐第一次登上文献历史的舞台，当时所率只有三四千骑。桓帝延熹元年、二年（158、159年）复入雁门一带，双方亡失也仅一二百人。用兵规模不大，且均局限于檀氏原牧地附近，显然檀石槐仍不过是一部之长。檀石槐由一个部落大人发迹而为尽据匈奴版图的大国之汗，大约在延熹三至九年间（160—166年），延熹六年（163年）五月，鲜卑寇辽东，是役虽不过千骑^⑥，但标志檀石槐的势力已经发展到辽东，却值得注意。王沈《魏书》总叙檀石槐的功业时说“南钞汉边，北拒丁令，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檀石槐“东

却夫余”，盖在此时。千余人寇边之举，当是偏师所为。

按《后汉书·东夷夫余传》：“夫余国在玄菟北千里。南与高句骊、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涉地也。”又云：其“于东夷之域最为平敞，土宜五谷”。其地当在大兴安岭东侧之松嫩平原。^{①7}163年左右檀氏“东却夫余”，从而使夫余国“西与鲜卑接”，大兴安岭西侧之呼伦贝尔草原，显然已经处于他的势力范围以内。当时驻牧于呼伦池一带的拓跋部正是献帝陵为首长。史称檀石槐“兵马甚盛，东西部大人皆归焉”，陵听领导的拓跋部，自当于此时归属于檀石槐。

在东进前后的数年内，檀石槐尽有匈奴领土，但是由于经济、政治和民族关系诸原因，檀氏之庭始终在弹汗山，他将自己的政治中心置于漠南，并进一步将鲜卑诸部安排在沿长城一线，于是从公元一世纪开始的乌桓、鲜卑诸部沿长城西迁的过程加快，形成了新的浪潮。

拓跋部与中原地区之间，早已经建立了相当密切的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文化联系。呼伦贝尔完工墓葬发现之丝绸、麻布以及海贝、珊瑚等^{①8}，扎赉诺尔墓葬出土的轮制灰陶罐、织锦、漆器以及规矩镜等^{①9}，均为来自中原的遗物。这些考古发现，不仅反映了东汉时期呼伦贝尔与中原经济文化联系的紧密，而且也深刻地表现了拓跋鲜卑诸部对中原文明的喜爱和向往。

在这种历史和政治背景下，《魏书·序纪》所记“神人”言自会引起我们的极大兴趣。《序纪》称：献帝陵

时有神人言于国曰：“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居。”

这一则貌似虚无缥缈的神话，其实隐藏着一段重要的历史事实。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一个处于文明门槛前的民族，把一些重大的历史事变归诸某个神话性、传说性的人物，是普遍现象。北美印第安人易洛魁部将他们的部落联盟的建立，归功于哈——约——温特——哈这样一个神话传说性人物。^{②0}中国古代更不乏这样的例子。黄帝、炎帝、嫫祖、苍颉等等一大批人物都属于这种类型。我们从哈哈镜中歪曲了的形象，总可以感受到某种历史的脉搏；而拓跋族的这一传说，似更要真切一些。

拓跋族南迁在公元二世纪前期，南迁导致拓跋鲜卑社会的飞跃发展，同时也使拓跋族能够更多地吸收中原文化。桓帝薨死，其“辅相”卫操曾为之立碑颂功德，碑文为长篇骈体文，^{②1}关于拓跋早期历史的文字纪录，似应始于此时。此距献帝陵南迁，不过四世一百六十余年，人们的记忆犹新，指示南迁的“神人”，应该实有所指。事实上，我们透过笼罩着“神人”的缭绕祥云，也能够看到檀石槐的影子。

公元163年左右，檀石槐东却夫余，势力扩展到呼伦贝尔；是征服，还是自动归附，详情已不得而知，总之拓跋部的首领陵归属了檀石槐。且由于檀石槐的光辉业绩，使拓跋人“认为自己的伟大和尊贵，就在于跻身于他们之列”，^{②2}因而檀石槐的命令必须执行，他的至高无尚的地位无异就是“神人”。

“神人”指示，“此土荒遐，不可以建都邑，宜复徙居。”所谓“建都邑”，自系后来傅会粉饰之词，但认为呼伦池地区荒僻，远离经济繁荣的内地，应该迁住长城沿线，这不仅表达了拓跋族的强烈愿望，成为促成拓跋南迁的强大动力，而且完全符合檀石槐的政治蓝图。

“神人”所言，实际上不过是将檀石槐的指令，披上一件神圣的外衣。

既为檀石槐的指令，为什么不直书其事？檀石槐所建立鲜卑汗国，一度统治整个内外蒙草原，这是自匈奴冒顿单于以来最辉煌的成就。鲜卑成为显赫的、令人敬畏的称号。拓跋

贵族自君临北中国以后，总是力图独占鲜卑这一光荣的名字。他们宣称只有自己才是正宗的鲜卑嫡裔。东部鲜卑传说，鲜卑为东胡之一支，“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②；拓跋贵族就声言“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④，也制造出一个鲜卑山，且冠“大”字，以示货真价实。他们甚至不承认在鲜卑发展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东部鲜卑慕容氏为鲜卑，而名之曰“徒何”。因为同样的原因，对于檀石槐和他的汗国，以及拓跋曾经归附檀石槐为其属部的历史，则一概予以抹杀，讳莫如深。遍拣洋洋数十万字的一部《魏书》，竟无只字涉及檀石槐者。这些，或许在邓渊撰《国纪》时已经如此，更可能是在崔浩因国史得祸时，拓跋早期历史遭到全面篡改，而变成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样子。

四、结语

经过上述考订，我们似乎可以作这样的结论：1、拓跋部由呼伦贝尔草原南迁阴山北麓匈奴故地，约在公元163至166年之间。2、公元163至166年之间，檀石槐征服呼伦贝尔草原各部，拓跋鲜卑成为檀石槐鲜卑汗国属部，其南迁乃按檀石槐的部署进行。

注释：

① 《通鉴》卷77，魏景元二年胡注。中华书局标点本作“置鞬落罗、曰律推演、宴荔游等”。此处标点从马长寿，见《乌桓与鲜卑》第2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② 《乌桓与鲜卑》第242页。

③ 中华书局标点本《通鉴》同，见注①。

④ 《乌桓与鲜卑》第242页。

⑤⑧ 《后汉书·南匈奴传》

⑥ 《后汉书·西羌传》

⑦ 摩尔根《古代社会》（新译本），上册，第83页。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⑧ 《晋书·吐谷浑传》

⑩ 明代中原汉人称蒙古麻古可儿吉斯汗为小王子，其后继者脱思、把秃猛可、伯颜猛可等亦被称为小王子。参见《明史·鞬鞞传》、郑晓《今言》等。

⑪ 《乌桓与鲜卑》第243页注。又，拙作《战国历史上的“匈奴”》（载《光明日报》1963年4月10日）曾引王先谦补注“头曼城盖即冒顿父筑”为旁证。近熊存瑞同志重提此文，认为王先谦所云“与匈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的特点不符，亦未获考古印证”并以此否定拙稿“战国晚期匈奴族活动中心在河套西北”的结论。（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一期。熊文说，曹永年认为“战国时匈奴应居河套”，与我的原意不符。）拙文系二十多年以前的习作，稚拙、错误之处不少，所引王先谦说即一例。但并不能因此无视头曼城与头曼的关系。按《汉书·武帝纪》：太初三年“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

外列城，西北至卢胸，游击将军韩说将兵屯之”。（参看《匈奴列传》）《地理志》五原郡稠阳县条：“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此列城皆太初三年光禄勋徐自为所筑甚明。时上距头曼不过百年，头曼建牙何处，西汉朝廷自不会不知。光禄城显为纪念工程负责人徐自为而命名，那么头曼城之得名与头曼之牙帐所在自不能没有关系。

⑫⑭ 《魏书·序纪》

⑬ 参见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28，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66。

⑭ “九世”原作“七世”（见中华书局标点本）。姚薇元先生据《晋书》载记及《御览》卷126引《南凉录》所叙秃发世系改。见《北朝胡姓考》第241页，“源氏”条注。

⑮ 《三国志·鲜卑传》裴注引王沈《魏书》：“自檀石槐死后，大人遂世相袭也。”范晔删“死”字，当有所据。

⑯ 《后汉书·桓帝纪·鲜卑传》

⑰ 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古墓清理简报》，载《考古》1965年第6期。

⑱ 郑隆《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调查记》载《文物》1961年第9期。

⑲ 《古代社会》，上册，第124页。

⑳ 《魏书·卫操传》

㉑ 拉施特《史集》，余大钧等译，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66页。

㉒ 《后汉书·鲜卑传》

〔作者工作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 汤晓芳）